



陕西出版基金项目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家 论 著 丛 书

主编 郝振省

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王云五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王云五
落

西北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 编
郝振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 王云五著. — 西安: 西北
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14-0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新闻-专科目录学
IV. ①G25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374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王云五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14-0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云五(1888—1979)，名鸿楨、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出生于上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1907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底后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



国公学大学部英语教授；1921年，由胡适推荐到商务编译所工作。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是著名出版家。

1954年，王云五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1964年，他退出政坛。

编著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王云五开办并复兴东方图书馆，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等。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大量贡献，2013年《王云五全集》出版。

编辑说明

王云五是民国时期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对图书分类、目录学以及四角号码检索法、词典编纂多有建树。《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就是他194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著作。

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美欧图书分类方法，他联系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有机地把两者予以结合，根据实用方便的原则，独辟蹊径，提出自己的新方法。

这次整理重版，改原版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改正了异体字、俗体字等，纠改了原版中的错讹字词，依现今规范添加了文中大量的篇名书名号、引文的引号等排版符号，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

总 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的高度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序

我自从民国十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跨进了出版家的门槛，旋兼任该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馆长，掌管那时候全国最丰富最名贵的藏书。一方面为着调整出版物的系统，他方面要使藏书发生最大的效用，自然而然地加紧了我对于目录学的研究，同时因适应现代的需要，也认为我国旧日的目录学有革新之必要。于是民国十五年我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之创作。其前一年半，我又有“四角号码检字法”之发明，经三四年之继续改进，卒于十六年底达成现在之方案。这两种方法，一关于图书类别之统驭，一关于文字工作之利便，除助我完成东方图书馆藏书五十余万册之新式的编目，而增进其在检查上之效率外，更鼓起我化身千万图书馆，使遍设于全国之兴趣。

因此，我于民国十八年创编“万有文库”初集，期以整个普通图书馆的用书，依最经济与最便利之方式供献于社会。此种冒险的尝试，初时几至失败，结果幸而努力不落空，第一版所印五千部，不仅占据了每一个已成立图书馆的书架，而且专赖这部书而成立的图书馆多至千余所。再过二三年，商务印

书馆遭“一·二八”沪战的致命伤，数十年基础几乎毁于一旦。那时候我以该馆总经理而兼编审部部长的地位，勉任艰巨，为事业与文化而苦斗。于二十一年八月该馆经半年停业而复业之际，首先发表编印“大学丛书”计划，窃不自量，欲以创深痛巨后一个出版家的努力，用本国文字供给最高学府之全部教科参考用书，一改前此依赖外国文课本之习，而植学术独立之基。是举借全国学术界领袖之赞助，得如所期望而进行。迄“八一三”第二次沪战，五年之间，已编成出版者达二百六十余种，视原预算略有超过。在此期间，我又继续前此所定充实图书馆而使之普遍化的计划，拟将二千册之“万有文库”初集扩充为一万册，即除续编“万有文库”二、三两集各二千册外，另辑印“丛书集成”初编四千册。然以战事之影响，二十三年九月开始印行之“万有文库”二集与二十四年三月开始印行之“丛书集成”初编尚有一部分未能完成，而“万有文库”三集更难具体化；是此计划之完成，只好期待于抗战胜利之将来了。

我的出版方针，除注重整个图书馆的供应外，对于分科之供应亦未尝漠视。民国二十一至二十六年间，编印之专科丛书不下数十部，各部门大都具备，其间规模较大而着手亦较难者，莫如“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印伊始，曾作相当研究，以中国文化悠久，史料又甚繁复，欲作综合的编纂，既非一手一足所能任，尤苦组织困难；故于二十五年秋决定编印文化专史八十种，广延专家，分科担任。于此可见此时期所编“专科丛书”之一斑。又自从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以来，我即有志于辞典之编纂，私人公暇，朝斯夕斯，无不以搜罗资料，供大规模辞书之编纂为主旨；十年之间，日积月累，得资料七百余

万条，悉依四角号码编次，以简御繁，一检即得。二十五年三月与中山文化教育馆订约，利用此项丰富资料，仿《牛津大辞典》体例，编为《中山大辞典》，正开始排版，而战事突发，原计划不得不停顿。因以所收关于“一”字之资料五千余条，约一百万言，刊为长编，冀保存所集资料之万一。

本书所收各文，悉为记述上开工作之旧作。我印行本书之目的，则以各文虽仅记个人工作之经过，然无一不与我国新目录学关联。方今人事日繁，治学尤贵省时。目录学为治学指南，其难其易，与治学之难易攸关。图书分类为新目录学之纲领，检字法为新目录学之重要工具；此固尽人知之。治目录学者莫难于我国旧学。所谓国学浩如烟海，每令人望而兴叹，时贤遂有国学必要书目之编定，已刊行者多至十余种。我于选印“万有文库”中之“国学基本丛书”，亦曾特加注意；一二两集所收之国学基本书四百种，与其类别并与各家书目之比较，似不无参考价值。我国所称丛书多至数千部。张香涛虽劝人“欲多读古书，非多买丛书不可”；然以丛书之名实不符与内容琐杂者比比皆是，苟不抉择，则糜费金钱所关尚小，耗废精力，影响实大。我的编印“丛书集成”计划，即以节省读者物力精力为出发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则号称数千部之丛书仅存数百部，更选定其中最重要之百部，就所涵各书汰其重复，依新分类法辑印；然仍恐读者不明原书真相，因各撰提要，以识梗概；此于阅读丛书者当可节省一部分之工力。至于“大学丛书”各院系之科目，系商同国内许多专家所订定，并一一分注其编印进度，于此可概见国内各科专著之现状。他如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与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两文，一则概述文化史资料之源，一则说明搜集辞书资料与编纂

辞书计划；似皆与治目录学者有多少关系。

尚有说明者，此区区十篇之文字，无一不以长期间写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费时约一年；“四角号码检字法”费时至三四年；“万有文库”第一、二集之计划，费时光在半年以上；“丛书集成”初编之选辑分类，费时一年以上；编印“大学丛书”之拟目与筹备费时七八月；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之研究，虽为时最短，亦不下二三月；而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自开始搜集资料，迄“一”字长编之印成，为时多至十年。总计过去十五六年间，个人之治学治事无不与此十篇文字息息相关。行文固贵有实质，此中各文，不仅侧重此点，且无一不寓有长期辛苦之工作；独惜言之无文，或不能行远而已。然而敝帚自珍，深恐十余年辛苦工作之结果，或有散佚，尤以抗战以来，原载各篇之书刊大都毁版，因收集而汇刊之，并借此就正于海内宏达。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五日 王云五

目 录

总序	郝振省 (1)
序	1
一、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绪论	1
二、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25
三、印行“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缘起	43
四、“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目录	48
五、辑印“丛书集成”序	65
六、丛书百部提要	68
七、编印“大学丛书”之经过	108
八、“大学丛书”全目与其在五年间之编印进度	114
九、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	137
十、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	183
附录 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	205

一、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绪论

I

图书分类法究竟是什么？据美国卡特氏（Cutter）说：“图书分类是集合各种图书，选择其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就这定义看起来，可以知道其至少含有下列两条件：

（一）须要按着“性质相同”的去分类；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图书内容在科学上所占的地位而分类。

（二）须把所有图书按照他的种类分别陈列起来，务使同类的书不要分开，不同类的书不要搀入。

这定义是很妥当的。我们研究图书分类的人，总要把它做得像才好。

关于第一条，我们有应先注意的一点，就是图书的分类，有按形式和性质的区别。按形式分类的，像版本的大小，出版的时期和著者的身份等都是。这些分类方法，都是很粗疏的，不适用于现代复杂图书的分类，这里也不必加以讨

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只是按性质分类的种种方法。

我国图书分类法，最古的当推汉朝刘歆的《七略》，就是把图书分做辑略、文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纪略七大类。其后历代均稍有变动，直至唐朝，才有所谓四部分类法，就是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的方法。自唐朝以来，这分类法也时有变动；至清初修《四库全书》，虽然把细目增订了不少，根本上却仍不脱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从表面上观察，这虽是按性质的分类法；但细细研究起来，还是多少倾向于形式的分类法。譬如经部的书本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若严格按性质分类，当然是不能归入一类的。但旧法分类的原则，因为这些书都是很古的著作，而且是儒家所认为正宗的著作，便按着著作的时期和著作者的身份，不问性质如何，勉强混为一类。关于子部呢，也是同样的情形，把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的书籍并在一处。关于集部，尤其是复杂，表面上虽偏于文学方面，其实无论内容属哪一类的书籍，只要是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的，都当它是集部。所以四部之中只有史部还合乎按性质的分类；不过目录学因为没有相当的部可入，也归入史部，这一点似又与依性质的分类的宗旨不符了。

外国图书按性质的分类，可说是发源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主张把学问分做历史、文学、哲学三大类。后来英国培根氏（Francis Bacon）再把这三大类分为若干小类，这就是图书分类的滥觞。欧美各国对于图书分类的专家，像英国的爱德华氏（Edwards）、桑纳新氏（Sonnenschien）、勃朗氏（Brown）、法国的布拉特氏

(Brunt)，德国的哈特维氏(Hartwig)，意大利的邦拉几氏(Bonnaggi)和美国的哈里士氏(Harris)、伯肯士氏(Perkins)、斯密士氏(Smith)、卡特氏(Cutter)、杜威氏(Dewey)等，都按着学科各自作成一种图书分类法。其原则大概相同，不过分类的细目和方法各有不同罢了。现在且把这些分类法归纳做三种：

- (一) 第一种就是用字母作符号的；
- (二) 第二种就是用字母和数目作符号的；
- (三) 第三种就是完全用数目作符号的。

第一种的代表者就是卡特氏的图书分类法。他是把二十六个字母来代表各大类，然后在每字母之下，再加一个字母代表中类，以下由此类推，可以加上四五个字母代表小类，和更小的类。照这样计算起来，类别可以分至无量数。卡特氏的方法，除字母外，也兼用数字，不过他的数字不是代表学科类别，乃是代表国别及时代。换句话说，他的数字11—99是代表国别的；01—09是代表时代的；因此这分类法还算是用字母作符号的。

第二种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它是用二十六个字母代表十八大类，又于每字母之下，再加一个字母，代表中类；这一点是和卡特氏相同的。不过卡特氏方法，是不绝的增加字母，推演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却不然，它用了两个字母之后，便改用号码。所以他的形式是像HB329一般，前面两个字母，代表大类中类；后面三个数字，代表小节目。英国勃朗氏的分类法，和这方法形式上很相似，也是把字母和数字并在一处的。不过他只用一个字母，以后就改用数字。因此